

“七普”数据折射当前及未来几年就业形势 从劳动力数量大国向技能大国转变

■劳动报记者 陈宁

本报讯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有几个数据获得了专家的特别关注。第一个数据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根据统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 8.8 亿，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但不容忽视的是今后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并且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流动人口的数据，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 3.76 亿，比十年前大幅度增长了 69.3%；三是人口老龄化数据，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18.7%，比十年前提高了 5.44%。

专家指出，从这几个数据看，劳动力人口从经济相对滞后、就业条件相对差的地区，向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机会比较好的地区流动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而这一趋势背后，折射着我国当前或未来几年内的就业形势。

解决结构性矛盾 将成主要问题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但增速放缓。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这一数据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人口的“近忧远虑”。从数据上看，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人口仍是充沛的，但是从长周期来看，增速放缓的趋势是一个“警醒”。以人口惯性理论看，人口增速一旦放缓，抛物线将会快速下降。

全面放开生育，是他提出的首个建议。与此同时，他指出，技术赋能，解决我国目前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则是当务之急需要做出的政策储备。他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要从劳动力数量大国向技能大国转变，壮大高级蓝领队伍，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杨雄注意到，随着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第二，部分高校毕业生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出清等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对就业带来新的影响和新的挑战。

人口红利 向人才红利转变

普查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 岁及以上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比 2010 年提高 0.83 年。其中，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10.75 年，比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了 1.08 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铭看来，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养老金是否在财务上可持续，既实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又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即使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若劳动力的质量可得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得到不断提高，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压力、养老金体系承载的压力就可得到缓解。

因此他指出，要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有两条：第一，尽快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我们公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旧比 OECD 发达国家低四岁左右，因为我们实施的是 9 年制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实施的是 12 年义务教育。第二，为农村的孩子提高教育质量。农村户籍的孩子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要提高农村户籍孩子的受教育年限。

理性 看待延迟退休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人，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2010 年—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

杨雄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是，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充分地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于老年劳动力，就业市场老龄化也势必会带来生产效率下降，带来就业活力下降、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等影响。

对此，杨雄表示，“一刀切”的政策显然并不可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他认为“工种”或将成为关键。不同工种应该不同对待，充分考虑个人意愿以及综合全方位来考虑，阶梯式的循序渐进较为合理。

| 专家观点 |

普职融通迎来新发展

学生将拥有更多“转轨”机会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郭娜）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普职融通将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轨道学生与普通教育轨道学生，在升学、求职、工作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也将享有更平等的机会。

但社会大众对“普职融通”并不太了解，这种模式有什么意义？未来走向如何？劳动报记者专访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政进行详细解读。

普职融通 目前实施效果不佳

普职融通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指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合作，双方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资，实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比如 2015 年宁波市就在全市全面实施普职融通。在中职学校里开设融通班，学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按合作普高学校课程、教材、进度同步组织实施教学，经合作普高学校期末考核，选拔一定比例的优秀学生直接到合作试点普高中随班就读；普高学籍的学生，有意愿入职业学校学习的，在高二结束前，每学期初或期末时，可转入任何一所职校任何专业学习。

普职融通让学生在高中阶段还有选择的机会，看起来很美，但实施情况如何？

“普职融通在我国已经试点了三十余年，但是实施效果参差不齐。普职融通最终都演化成为学生进入普通高中的结果，双向通的理想设计变成了单向通的现实局面。”李政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普职融通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安排，在我国尚缺乏其生存的理念根基与制度根基，尤其是对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认识的异化，让普职融通难以做到平等双向的融通。

但职业教育类型的明

确，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普职融通在思想和制度层面可能存在的障碍，使得这一教育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

让学生找到 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目前，我国学制体系中主要有三类高中：普通高中、职业类高中（含中等专业学校、技校、职高）以及综合高中。综合高中介于普通高中和职业类高中之间，在初始学段，既提供职业教育，也提供普通教育，初始学段结束后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进入两轨中的任意一轨。

但现实是培养学术类人才的普通高中长期成为高中教育中的绝对主体，而职业类高中则逐渐走下坡路，其学校数量近年来下滑严重。综合高中也渐渐失去了“综合”的意蕴，成为延迟分流的代名词。

“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紧密贴近行业需求，尤其是在人才培养周期、课程设置、教学手段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这也就决定了职业学校的办学不能比照普通高中的基本模式，也不能假‘资源整合’之借口，抹杀不同学校原有的办学特色和需求。”

李政认为，职业教育的类型化特征迫切需要普职融通在人才培养上的纠偏。一方面，普职融通需要为学生提供多次、多元的升学选择，让学生在普职融通的框架下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普职融通要关注学生在职业定向与生涯发展中的基本趋势，以及一些学生在职业技能中的表现，发挥为职业院校选拔具有潜力的高技能人才的基本功能。

“实际上，一些学生可能在学术知识的学习上表现得不尽人意，但是实践性强的技能学习却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李政说，过去限于职业教育“断头教育”的制度设计缺陷，以及公众对职

业教育的误解，很多学生在选择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有所顾虑。新时期的普职融通必须要通过消除社会误解的方式，让学生能够主动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未来：招生、考试等多方面融通

在过去，普职融通强调的是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之间的资源融通，例如课程上的互选、师资上的互派等。这种资源上的融通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学校学生接触职业教育提供了机会，但很难帮助学生建构对职业教育和生涯发展的整体印象，因为资源融通是最表面的融通。

李政认为，未来的普职融通，应该实现“资源—组织—理念”三个层面的融通。除了资源融通，要进行组织融通，也就是两类学校要在建制层面协调行动。此外，还要理念融通，学校师生、家长都能够在一致的理念上选择适合的教育。

此外，李政认为，未来的普职融通还要走向系统融通。

首先在起点实现融通，在招生阶段就实现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学籍互认，两者的学籍具有平等的地位。

其次是过程融通，李政提出，要在高中三年或更加灵活的时间里，给予学生多次分流和选择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普通教育课程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学习，以及在生涯指导老师的帮助下，逐渐明晰个人的生涯发展路径、职业兴趣以及能力特征，从而确定发展的轨道。

“最后是终点融通。”李政表示，未来的高考将不仅仅只有普通高考，职业教育也将拥有自己的高考。这样，学生无论是在职业学校毕业，抑或是在普通学校毕业，均可以参加两类高考中的任何一类，从而在选拔机制中发挥自己的强项。